

云南大学的中国边疆学

——基于学科建构的回顾与展望*

林文勋 罗 群 潘先林

由于区位的因素,云南大学一直是中国边疆学研究的重镇之一,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和调研咨询报告,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经验和深厚的学术传统,在国家有关西南边疆重大战略选择与政策制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受到国际学术界的肯定与重视。当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国家地缘战略的调整,梳理 90 多年来云南大学的中国边疆学研究,总结成就,讨论不足,分析特点,展望未来,就有了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云南大学 中国边疆学 学科建构

作者林文勋,1966 年生,历史学博士,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长;罗群,1968 年生,历史学博士,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副院长、历史系主任;潘先林,1967 年生,历史学博士,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地址: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邮编 650091。

近年来,国际风云变幻频仍,中国的周边安全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与挑战。中国政府适时提出“一带一路”的新丝路计划,重新定位中国的地缘战略。与此同时,新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让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即加强四个认同。^①于是相关机构、研究单位和社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调整思路,改弦更张,开展有关国家安全、边疆巩固、“一带一路”战略的总体规划及路线图、沿边各民族四个认同等问题的研究,气势恢宏,成就显著,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向西开放、走出去、移动边疆、利益边疆、四个认同等概念成为社会热点。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节点,同时也是国家稳定发展、西南国防巩固的重要因素。90 多年来,由于区位的因素,云南大学一直是中国边疆学研究的重镇之一,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和调研咨询报告,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经验和深厚的学术传统,在国家有关西南边疆重大战略选择与政策制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受到国际学术界的肯定与重视。当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国家地缘战略的调整,梳理 90 多年来云南大学的中国边疆学研究,总结成就,讨论不足,分析特点,就有了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 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滇学研究基地”重点项目“滇学通论”(项目批准号:JD2010ZD05)、“二十世纪云南地方历史文化研究述论”(项目批准号:JD2011ZD05)、“滇学研究体系构建研究”(项目批准号:JD2014ZD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马戎:《旗帜不变,稳住阵脚,调整思路,务实改革——对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解读》,《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72 期,第 4 页,2014 年 11 月 30 日。

义。同时,展望未来,就新形势下云南大学的中国边疆学研究提出新的设想、新的规划,以期再现辉煌,重铸经典,推动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构建和发展,为新时代的国家安全、边疆发展、民族团结做出不负于时代的贡献。

一、90 多年来云南大学的中国边疆学研究

90 多年来云南大学的中国边疆学研究成就,前辈学者多有论述。有分时代、分阶段讨论的,有分历史、地理、边界、民族等专题讨论的,也有紧紧围绕方国瑜等著名学者讨论的。本文限于篇幅,仅就其荦荦大者,略举数端,以概其全。

(一) 私立东陆大学筹设滇边调查部。1923 年 6 月,私立东陆大学校长董泽以“滇省西界西藏,东南界安南,西南界缅甸,缅甸之东南又界暹罗,边务之重要,关系于时局、前途非浅。而吾滇尤唇齿相依,际此强邻窥伺之秋,设不注重边防,何以攘外而戢内”向省长唐继尧建议,“以教育之设施,为国家之补救。兹者内维国势,外度藩疆,知非熟探边务,无以开外境之财源;非培养通才,无以施殖边之政策……拟就东陆大学附设滇边调查部”。“本部以探察边徼内情,开浚富源,实行工商政策,抵制外人覬覦,巩固滇边防为宗旨”。“分系为四:一曰西藏;二曰缅甸;三曰安南;四曰暹罗。以上各系,从经济、人才、利益及紧急方面观察,以西藏为最要,故拟先办西藏系”。^① 建议虽未能付诸实行,但是它反映了私立东陆大学对云南在西南国防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对云南在涉藏及处理与东南亚诸国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在涉藏研究及东南亚研究与治边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高度自觉和深刻认识。

(二) 方国瑜参加中英会勘滇缅南段未定界。受 1934 年发生的班洪事件的刺激,时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学习的滇籍学者方国瑜由国学研究转向边疆研究。“民国二十四年四月九日,我外交部与驻华英吉利国公使,签换照会,重勘悬案三十余年之滇缅南段界务,闻之亦喜亦忧,草成《葫芦王地之今昔》一文载《新亚细亚》月刊九卷五期,《滇缅南段未定界之孟仑》一文载《边事研究》二卷一期,《条约上滇缅南段未定界之地名》一文载《民族杂志》三卷八期,颇多建议。”^② 此时,中英双方正在交涉界务,议定两国派员并由国际联盟派中立委员会会勘滇缅南段未定界。方先生的文章引起了中国委员尹明德的注意。尹明德希望方国瑜能参加勘界委员会的工作,方国瑜欣然接受了“中英会勘滇缅南段未定界”中国委员随员的职务。为了把边界勘察工作完成好,1935 年 9 月,方国瑜先于勘界委员会的其他人来到昆明,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查阅政府的有关档案。勘界委员会于 1935 年 10 月 30 日起程,1936 年 6 月 20 日回到昆明。参加完中英滇缅边界南段界务会议后,方先生更加认识到研究边疆问题对于捍卫祖国边疆、维护国家统一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知识分子的爱国良知、社会责任、历史使命促使方先生放弃南京中央研究院优越的学术条件和已取得显著

^① 《私立东陆大学拟办滇边调查部呈省长意见书》(1923 年 6 月)及附录《东陆大学附设滇边调查部简章》,刘兴育主编:《云南大学史料丛书·学术卷:1923 年—1949 年》,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4 页。

^② 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自序》,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 1943 年 7 月印。按:发表时间分别为同年 5 月 1 日、6 月 15 日、8 月 1 日。

成就的学术课题,毅然决然回到云南昆明,执教于云南大学。^①这标志着云南大学边疆研究的开始。

(三) 方国瑜、凌纯声等创办《西南边疆》杂志。日本全面侵华后,《禹贡》杂志、《新亚细亚》、《边事研究》等边疆研究的大型刊物或被迫停刊,或被迫转移发行。而在云南所办的刊物中,涉及边疆研究者只有1923年张天放、寸树声发起创办的《曙滇》和1938年5月1日创刊于腾冲的《晨曦》,皆未形成气候,难以满足昆明作为战时学术中心,服务抗战建国的时代需要。这样,在昆明创办一份杂志,作为内迁学者与云南本土学者之间交流、沟通、讨论的学术平台,就显得极为重要。而刊物的创办,需要内迁学者和云南学者中热心边疆研究的人士来积极组织。1938年10月,云南大学方国瑜教授与迁滇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凌纯声在昆明创办《西南边疆》,由方国瑜任主编,至1944年6月停刊,共发行18期。该刊是战时西南边疆研究中最权威的学术刊物,不仅可视为西南边疆研究的资料库,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而且还刊登了较多讨论社会现实的文章,具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②

(四) 顾颉刚与云南版《益世报·边疆周刊》。1938年12月8日,天津《益世报》在昆明复刊,云南大学教授顾颉刚负责编辑该报副刊之一《边疆周刊》。至顾先生1939年9月初离开云南,共发行了27期,《益世报·边疆周刊》重点关注边疆和民族问题,偏重云南。^③滇版《益世报·边疆周刊》可视为顾先生所办《禹贡》半月刊在云南的延续。1934年2月,顾先生在北平办《禹贡》半月刊。因受同年夏绥远之行的刺激,顾先生意识到边疆问题的严重,遂在《禹贡》半月刊讨论起边疆问题来,也讨论起民族演进史和文化史来。^④1936年9月,燕京大学成立边疆研究会,顾先生当选为理事。同时,燕京大学设立边疆问题研究会,该会以研究讨论及促进边事改善为宗旨,顾先生为核心人物。该会会务分五组。第一组为研究组,理事是冯家昇,研究组又分东北股、西北股、东南股和西南股。西南股由张印堂负责,地域包括云南。^⑤1939年6月5日,《益世报·边疆周刊》刊出《我国边疆学之内外研究略史》一文,内容与《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燕京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本会成立宣言》几乎完全相同,仅就各部分的顺序做了调整。《我国边疆学之内外研究略史》第三部分为“我国边疆学之发动及将来”。该文虽署名“伯平”(即冯家昇),实际上是顾颉刚等《益世报·边疆周刊》同仁的集体意见。^⑥顾先生离滇后,《益世报》转到重庆出版,但《边疆周刊》则在云南得到延续。1943年9月16日,云南省民政厅成立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为介绍边地政情民俗,促进国人对于边疆之认识兴趣而利边疆建设起见,特编辑《边疆》周刊一种,借昆明《正义报》篇幅出版。^⑦

① 林超民:《应对边疆危机的新学科——边政学的兴起与发展》,张波主编:《丽江民族研究》第2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88页。

② 参见娄贵品:《方国瑜与中国西南边疆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③ 参见王珺:《从〈益世报〉副刊看抗战时期的边疆民族研究》,《东陆学林》第15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④ 参见顾潮:《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半月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期。

⑤ 参见《燕京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汇报》,1937年1月。

⑥ 参见娄贵品:《近代中国“边疆学”概念提出与传播的历史考察》,《学术探索》2012年第8期。

⑦ 参见《一年来边疆行政设计概况》,云南省民政厅编印:《一年来之云南民政》,1944年。

(五) 吴文藻的云南经历与“边政学”的提出。1939年吴文藻先生到云南大学担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在云南大学设置的社会人类学讲座课程后,又负责指导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派到云南大学开展研究的岑家梧、费孝通、江应樑、宓贤璋等研究人员。虽然吴先生在回忆中说在云南大学时期由于忙于安排同仁们的实地调查和教学任务,未能认真从事著作,尤其遗憾的是,虽身处多民族地区,却没有把握良机亲身参加实地调查,^①但是,吴先生指导岑家梧开展中国史前艺术史及中国原始艺术史研究,指导费孝通开展西南种族研究,指导江应樑开展云南彝夷民族研究,指导宓贤璋开展西南苗瑶民族研究^②的过程本身及其在云南的切身感受,对于其加深对边疆的认识仍有明显意义。在到云南之前,吴先生亲临边疆仅有1934年夏天在绥远的短暂之旅,^③在云南期间吴先生还与昆明的边疆研究人士有广泛接触。吴先生不仅在云南进行“社会学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而且,为提倡并协助云南省内及近境之一切实地调查与研究起见,还与同行在昆明成立了云南省民族学会。^④虽然后来因会员分散,工作陷于停顿,但这是民族学传入和在云南发展的标志性事件。1940年年底,因庚款讲座受到干扰,不能继续,吴先生到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担任研究工作,负责对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和提出处理意见,同时还兼任蒙藏委员会顾问和边政学会的常务理事,协助《边政公论》杂志审稿、撰稿和介绍稿件。^⑤受蒙藏委员会的委托,^⑥撰写了后来影响甚大的《边政学发凡》。^⑦这期间吴先生研究不多,学术文章写得很少。^⑧可以说,吴先生的云南经历是其“边政学”学科构想的重要基础。

(六) 国立云南大学成立西南文化研究室。1942年7月,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成立。该室“研究工作之地域以云南、西康、贵州为主,次及西藏、四川、湖南、两广,又及安南、缅甸、暹罗、印度、马来半岛诸境”。至1953年10月解散,该室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编印《云南大学学报》1期,出版“西南研究丛书”10种,在民族史研究、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文化史研究、区域地理研究、目录学研究、东南亚史研究等六个方面做出开创性贡献,开创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西南学”研究,在西南研究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⑨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马长寿先生说,全面抗战爆发后,无论公私机关,或学术的与政治的机关都先后成立研究边疆的机构,但是不幸,完整的报告与专著之出版数目少于研究的机构之成立数目。^⑩西南文化研究室的设置只是先奠定一个基础,并不是最终目的,

① 参见《吴文藻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1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05页。

② 参见刘兴育主编:《云南大学史料丛书·学术卷:1923年—1949年》,第184—187页。

③ 参见吴文藻:《蒙古包》,《华年》第4卷第24期,1935年6月22日。

④ 参见《云南民族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函请云南省党部派员出席指导》(1939年1月18日),刘兴育主编:《云南大学史料丛书·学术卷:1923年—1949年》,第4页。

⑤ 参见《吴文藻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1卷,第405页。

⑥ 参见王利平等:《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边疆和边政研究——李绍明先生访谈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2期。

⑦ 参见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第1卷第五六期合刊,1942年1月10日。

⑧ 参见《吴文藻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1卷,第405页。

⑨ 姜贵品:《方国瑜与中国西南边疆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⑩ 参见马长寿:《中国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边疆通讯》第4卷第4期,1947年4月。

“待将来基础较固，改组为研究所”。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内迁西南的研究机构和高校陆续返回复校，内迁专家学者亦多陆续离滇，这势必对该室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为避免因各校复员而导致研究工作中断，熊庆来拟将西南文化研究室与西南社会研究室合并，扩充为西南文化社会研究室，聘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教授担任讲座教授或导师，但未得到三校的赞同。^①

（七）私立五华文理学院建立“边疆文化学系”。抗战胜利后，随着众多文化教育机构陆续离去，云南文化教育事业顿显空虚，战后百废待举、急需人才的局面，使一些文化、教育界人士深为忧虑，深感必须创办一所地方大学，以充实云南高等教育、培养地方建设人才，同时也可以满足云南青年进一步深造求学的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私立五华文理学院应运而生。1946年8月，五华学院正式发起成立。1950年设置“云南边疆文化学系”。这是一次构建边疆学学科的宝贵尝试。边疆文化学系虽然存在时间短，实际建系还不到一年，甚至没有一届学生毕业，但不论在云南教育史上，还是在边疆学科的发展史上，都具有独特的意义。第一，边疆文化学系汇聚了一批边疆研究的专家学者，是继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之后，云南边疆研究群体的又一次大聚合，有利于边疆研究与教学的系统开展和有序推进。第二，边疆文化学系的建立构成了云南边疆研究传统链条中的一环，是云南本地边疆研究传统的延续、继承和发扬；其对边疆文化学系这一学科的一些设想和探索，也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②

（八）江应樑代表民族学、人类学界阐述“西南学”。1948年11月，国立云南大学教授江应樑代表民族学人类学界阐述“西南学”。之所以提出这一重要学术概念，是鉴于我国西南地区的特殊性及其学术资源的丰富性。江先生指出：“我国西南边区诸省，包括粤、桂、滇、黔、川、康以至西藏、台湾，不论从文化、社会、民族、历史、地理任何方面说，都有其独特的异于其他省区的实像。”同时，西南是学术研究的宝库。因此，“今后凡研究西南诸省区域内任何问题都可以成为专门学问，凡属于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实在可以给他一个专门名词，称之为‘西南学’”。当然，站在民族学人类学的角度，江先生认为：“如果‘西南学’一名真能成为一个学术上的专词，那我们相信，西南学中最值得研究的部门应当是西南社会。”因为“西南社会之具有多种组织形态，且有着无从估计的研究价值。不仅是横的方面，在现时世界各地所能见到的社会机体，除了一二特殊情形者外，都可以在西南角落中见到。且在纵的方面，现代国家中已经没有了的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之留下了一个历史上的名词，我们却能在西南边区中看到现实的例证。总之，西南这一个区域内，新至时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在这里看到，虽然是具体而微；旧至原始的民族部落制度，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发见，而且是很清楚地存在着”。^③“西南学”的提出，是西南研究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

① 姜贵品：《方国瑜与中国西南边疆研究》，第226、227页。

② 沙文涛：《构建边疆学科的一次尝试——私立五华文理学院边疆文化学系述略》，林文勋、邢广程主编：《国际化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③ 江应樑：《西南社会与“西南学”》，《中央日报·社会研究（副刊）》第12期，1948年11月20日；江应樑：《西南社会与“西南学”（续）》，《中央日报·社会研究（副刊）》第13期，1948年12月4日。

(九) 云南大学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实现民族平等是中央政府的一项重大举措。为了实现民族平等,中央政府决定实行有各民族代表共同参加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此,中央先后组织了民族访问、民族识别及民族调查等重大活动。^① 1950 年秋,江应樑参加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到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访问,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并通过实地调查,为今后国家对民族地区各项政策的制定作扎实的准备。^② 1953 年 9 月,云南省民委为开展云南省少数民族族系分类的调查研究,委托云南大学的方国瑜、杨堃和江应樑研究民族问题。1954 年,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有关部门提出了过渡时期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总任务:巩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共同建设伟大祖国的大家庭;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保障各民族在一切权利方面的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祖国共同事业发展中,与祖国的建设密切配合起来,逐步地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逐步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落后民族得以跻身于先进民族行列,共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方国瑜被抽调参加云南民族识别研究组并任副主任。1956 年 7 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直接领导,为编写各少数民族史、志和民族自治地区概况,组成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到云南开展工作。^③ 云南大学的众多师生参加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同时,因 1955 年周恩来总理到云南大学视察时指示云南是我国多民族的一个缩影,云南大学历史系应该结合地方特点,加强民族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云南大学积极创造条件,于 1959 年增设了民族史专业,并招收了一届本科生和三届研究生。1964 年又成立了云南少数民族史研究室。

(十) 云南大学承担《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部分的编绘工作。1961 年,方国瑜负责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部分。方先生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了西南史地,与缅甸、越南、老挝有关材料则编入云南与邻近诸国关系的著作中,^④ 后来完成《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与《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两部经典著作,编纂《云南史料丛刊》。参与绘编工作的尤中教授也先后完成《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与《云南地方沿革史》。

(十一)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西南古籍研究所的建立。云南是中国西南边疆的重要门户,同时又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许多民族不仅与邻省的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有共同的族属渊源关系,而且与越南、缅甸、泰国、老挝等邻国的一些民族也有同样情况。所以,研究云南民族,必须放宽视野,要扩大研究云南邻省及邻近国家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这对建设好云南、保卫好云南,对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是有重要意义的。有鉴于此,云南大学拟将历史系原有的云南少数民族研究室扩建为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⑤ 1978 年 11 月 13 日,云南大学向教育部和省委宣传部提交了《关于建立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的报告》,申请建立与系一级平行的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主要研究西南边疆民族史、云南地方史和中外民族关系史(中越、中缅、中老跨境民族关系史),并积

① 参见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费孝通文集》第 14 卷,群言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0 页。

② 参见江晓林:《江应樑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2—163 页。

③ 参见方福祺:《方国瑜传》,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1、143 页。

④ 参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叙录》,《思想战线》1979 年第 5 期。

⑤ 参见张德光:《前言》,《西南民族历史研究集刊》第 1 集,1980 年。

极创造条件,开展西藏历史的研究。1980年,省委组织部批准成立,并任命江应樑为所长。^①云南省政府对该所的成立非常重视,“江应樑的所长任命书是由省长签署颁发的”。^②为了及时总结经验,检验研究成果,开展与有关单位的协作与学术交流,研究所出版年刊《西南民族历史研究所集刊》,1980年12月出版创刊号,到1986年出版了七集。1987年,该刊更名为《西南民族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了《西南民族史研究》(1987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党中央对我国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非常重视。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对整理我国古籍发出指示,强调通过“古籍整理,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云南大学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于1984年成立了西南古籍研究所。为提高工作能力,团结云南乃至西南各省从事古籍整理方面的学者于1986年开始出版《西南古籍研究》。目前已出版九卷。2009年,该刊入选杨玉圣教授整理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集刊名录》。

(十二)建立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1999年8月,在整合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等一批研究机构的基础上,云南大学成立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由学校直接领导,与学院平级。2000年12月,教育部批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为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研究基地。该中心的研究方向是,西南边疆地区民族关系与边疆稳定,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建设。2001年开始出版《西南边疆民族研究》集刊。该集刊2007年入选为CSSCI来源集刊,目前已出到第16辑。

(十三)大力提倡和开展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经过几代学者长期的努力,云南大学在中国边疆问题研究方面已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学术队伍,产生了大批有重要学术影响的成果,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而形成了重要的优势特色。

有鉴于此,2002年12月,林文勋牵头向云南大学提出开展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建议。建议指出,根据学科发展规律和现实需要,充分考虑云南大学的区位优势 and 已有研究基础与实力,云南大学中国边疆学学科拟围绕以下主要方向重点开展研究:中国边疆学理论、边政理论与实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边疆经济开发与对外经济合作、中国西南边疆问题研究等。建议提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目标和主要工作是要通过此后一段时间的重点建设,将云南大学建成全国重要的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高水平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将云南大学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成为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优势和特色学科。^③

2008年,云南大学在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自主增设中国边疆学专业博士点,并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通过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学科优势,再将学科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的优势,云南大学边疆问题的研究与人才培养蓬勃发展,积累了深厚的学术基础,并呈现出旺盛的发展潜力。目前,中国边疆研究已经成为云南大学重要的优势和特色学科。研究人员集中分布在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省重点研究基地“滇学研究中

① 参见云南大学档案馆藏,1979-Ⅱ-02-《我校1980—1981两年事业计划意见》。

② 江晓林:《江应樑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6页。

③ 参见《关于开展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建议》,林文勋:《学科建设与教学改革初探》,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6—137页。

心”、“国际关系研究院”、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研究院、人文学院历史系、公管学院政治系等院系，拥有多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和博士后流动站，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机制。通过整合学校优势力量，围绕边疆民族的重大问题集中开展研究。同时，云南大学抓住“211工程”三期建设的契机，设立了“西南边疆史与中国边疆学”重点建设项目，从中国西南边疆史、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关系史、中国边疆学研究三个方面，重点开展边疆问题的研究和边疆学学科体系的探讨，并有计划地开展整理西南边疆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调查和保存边疆口述史料，翻译和介绍国外学者关于中国西南边疆研究的重要成果等工作。目前已出版有云南大学“中国边疆研究丛书”，正在进行的还有近代西南边疆档案整理和云南通志馆征集各县资料整理汇编等。^①

“中国边疆研究丛书”已出版30余种，内容主要围绕“中国西南周边环境研究”、“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中国边疆学的理论与实践”和“中国西南边疆社会经济变迁”四个方面。在研项目中，仅云南通志馆征集各县资料整理汇编就达一千余万字。云南大学“中国边疆研究丛书”的出版对于巩固和提升云南大学边疆问题研究的水平与实力，增进与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学界有的专家评论认为“云南大学已初步在全国树立起了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大旗”。

总的来说，90多年来，经过一代又一代学者的辛勤耕耘，云南大学在中国西南边疆史地、开发、政区、社会、文化、经济、民族与考古、历代治边思想与治边政策、中国西南边疆研究的学术史、西方中国西南边疆研究的学术史、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关系研究、南亚东南亚研究、边疆学学科体系研究等方面已取得突出成绩，形成了优良的学风，凝练了明确的学科方向。当然，由于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广、内容多，研究人员少，各学科研究人员配合和交流不够充分，跨学科的研究尝试不太多，对海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新理论、新方法借鉴不够，对海外相关资料的搜集利用少等原因，我们的研究也还有进一步改进和提高的余地。

二、云南大学中国边疆学研究的特点

综上，我们总结云南大学中国边疆学研究的特点如下：

（一）云南大学的中国边疆研究，始终与国家重大战略选择与政策制定紧密结合，为维护国家统一、边疆安全和民族团结服务。

因地理形势的关系，云南自古即在国家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关于古代时期云南的地理形势，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輿纪要》卷113中说：“云南要害之处有三：东南八百、老挝、交趾诸夷，以元江、临江为锁钥；西南缅甸诸夷，以腾越、永昌、顺宁为咽喉；西北吐蕃，以丽江、永宁、北胜为扼塞。”近代时期，云南的地理形势变得更加重要。英法等国的步步逼近，使西南边疆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云南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国防前沿。^②“就国防言，实为康藏与长江的连锁，我国西南的门户！就国际形势言，云南又为远

^① 林文勋：《庆祝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30周年发言稿》（2013年11月15日）。

^② 潘先林、张黎波：《西南边疆早期现代化的主要现象及其与国家安全之关系》，《思想战线》2011年第2期。

东与近东的关键；欧洲与亚洲交通的枢纽！”^① 私立东陆大学自建校起就认识到云南在西南国防上的重要地位，此后，凡是国家战略中与西南边疆相关的重大事件，云南大学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英滇缅界务成为悬案后，因我国长期政局动荡，英政府乘中国乱局，将其边界要求付诸实践，对北段争议地区进行了实际占领与经营。^② 私立东陆大学拟设滇边调查部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熊庆来校长之所以向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申请在云大设立边政讲座，原因便是云南“地介英法两大势力之间，国防上亦是重地”，“云南接壤英法，国防、界务等边疆问题不胜缕举，自应预储专才，调查文化、政治、社会、民族、经济之真实状况，确立经营之政策与设计”。^③

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云南成为抗战建国的根据地及国际交通的要冲，地位越发重要。方国瑜与凌纯声办《西南边疆》杂志，“即在以学术研究的立场，把西南边疆的一切介绍于国人，期于抗战建国政策的推行上有所贡献”。^④ 顾颉刚在《益世报》编《边疆周刊》，“并非来凑热闹，为的是想供应现时代的需要”。“要把边疆的情势尽量贡献给政府而请政府确立边疆政策，更要促进边疆人民和内地同胞合作开发的运动，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⑤ 《益世报·边疆周刊》出《滇缅路线问题专号》，是因为东部沦陷，出海口被封锁，修筑滇缅铁路直达印度洋，以解决国际军运问题，关系国家存亡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未来，但路线问题引起争论。而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方国瑜、江应樑等驳斥大泰族主义等，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与统一。

1940年9月，日本南进侵入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云南既是后方，又成前线。联络西南毗邻各国对我国抗战前途影响甚巨。为此，1941年3月，云南大学拟设西南史地研究室。随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也有类似想法。4月1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在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设置边疆语文系与西北西南文化研究所培植筹边人才而利边政施行案》，以“西南毗邻各地方，如越南、泰国、缅甸、印度、南洋等处，无论在历史上、地理上、人种上、文化上、政治上、经济上与我均甚密切”，建议“由国民政府指定中央研究院设置西北文化研究所〔分蒙藏回（阿拉伯与缠回）三组〕，及西南文化研究所（分西南边区与越南、泰国、缅甸、印度、南洋等组），其研究之对象应分为语言、文化、地理、经济，每年将研究所得，提供有关党政及教育机关参考”。教育组审查时修正通过。^⑥ 受这一提案的影响，云南大学将正在筹备中的西南史地研究室，改名为西南文化研究室。同时，李根源也感到建立相关机构，加强西南研究的紧迫性。因到1941年10月，云南大学筹设西南文化研究室仍未实现，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关于设置边疆文化研究所的决议亦未见落实，李根源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上书，以建设边疆之迫切，请拨款在昆明设立西南边

① 张服真：《法帝国主义者侵略下的云南》，《新亚细亚》第2卷第1期，1931年4月1日。

② 参见朱昭华：《中缅边界问题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219—220页。

③ 《省立云南大学请求设置讲座书》（1937年8月6日），刘兴育主编：《云南大学史料丛书·学术卷：1923年—1949年》，第170页。

④ 《西南边疆》创刊号，1938年10月。

⑤ 顾颉刚：《发刊词》，昆明《益世报·边疆周刊》第1期，1938年12月19日第4版。

⑥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页。

疆文化研究机关。^① 蒋介石以“所陈关系国防文化百年大计，至甚注意，似应设法举办”命侍从室将条呈转给教育部及中央研究院，要求“妥商规划办理为要”，^② 但仍未能实现。

这样，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的成立就显得意义重大，诚如《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计划书》所言：“滇之西南区，土壤肥沃，资源极富，而地广人稀，榛莽未开。且地连缅越，与印度、暹罗、马来半岛诸境道途相通，不论民族、宗教、经济诸端，莫不息息相关。当集蒙人民，开发地利，进而求边外诸境之融合，与我协力，必大有助于我。”^③

抗战胜利后，云南大学计划加强西南文化研究，为国家处理与中南半岛诸国关系服务。1948年云南大学在致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函中说：“我国与中南半岛诸国，境域相接，诸凡经济、政治、文化、军事，莫不密切相关。当由多方面与之联络，而文化学术之合作，促进经济、政治、军事之关系者甚大。本校因此项任务，拟加强西南文化研究室工作。”^④

江应樑参加民族访问团，江应樑、杨堃、方国瑜受云南省民委委托研究云南少数民族族系分类等，云南大学师生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均是实现民族平等、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工作。

至于方国瑜负责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部分，正如方先生所说：“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之内在历史上的沿革，要反映作整体发展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区域，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而不是为历代王朝的政治服务，不能给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口实。”^⑤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云南大学的边疆研究始终紧密结合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和对外开放战略、云南省建设国际大通道、“兴边富民”、建设“和谐边疆”、国家开展“西南边疆项目”及“一带一路”战略的现实需要。

（二）云南大学的中国边疆研究，始终与云南省的社会发展、沿边开发等紧密结合，为地方建设、边防巩固服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也一直是云南大学边疆研究的重要使命。熊庆来校长上任之初即主张“预储专才，调查文化、政治、社会、民族、经济之真实状况，确立经营之政策与设计”。《西南边疆》载文涉及云南农业、畜牧业、林业、交通、水利、经济、边疆开发与边疆建设等。西南文化研究室着重探讨西南之开发、移民、地理、民族、文化、边疆经略、对外关系、边疆教育等。江应樑参加民族访问团，云南大学师生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也是促进地方发展进步的重要工作。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大学在边疆开发、边疆治理、边疆民族、边疆经济等方面的研究，目的都是为地方建设、边防巩固提供参考。如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成立初期的研究重点是：西南边疆地区民族关系与边疆稳定，以民族关系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影响边疆稳定的热点问题为研究重点；西南

① 参见李根源：《上蒋委员长请筹设西南边疆文化研究机关书》，《永昌府文征·文录》卷30民十二，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3076—3077页。

② 《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抄转李根源建议加强边疆文化研究机关代电及重要研究院办理情形呈》（1941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第143页。

③ 刘兴育主编：《云南大学史学丛书·学术卷：1923年—1949年》，第18页。

④ 《张福延向教育部呈报西南文化研究室工作概况》（1948年5月15日），刘兴育主编：《云南大学史学丛书·学术卷：1923年—1949年》，第17页。

⑤ 方福祺：《方国瑜传》，第169页。

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以云南经济史、西南边疆经济建设中的若干重大问题为研究重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以云南省跨世纪民族调研及脱贫示范服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为研究重点。^①近年来,云南大学在西南边疆的民族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社会控制、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建设等问题上形成一批具有重大现实价值的报告,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三)云南大学的中国边疆研究,始终勇于探索,在全国树立起学科建设与探索的大旗,居于国内先进地位。云南大学不仅始终重视边疆研究,而且还始终重视边疆研究的学科建设与探索。

私立东陆大学成立初期计划先设西藏系,再逐步增设缅甸系、安南系和暹罗系。虽然没有付诸实行,但是已经有学科建设思想的萌芽。

省立云南大学对边疆研究的学科建设也十分重视。《省立云南大学申请边政讲座理由书》中计划先设讲座一人担任滇边研究工作;日后就人才及经费之情形而徐图发展;最后拟在云南大学设一滇边研究组织及一边政学系以造就边政人才。

全面抗战时期,云南大学实际上开展了边疆学构筑的早期实践。1939年3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最后通过的边疆教育改进案规定:“教育部得指定国立各大学酌量增设有关建设边疆之科系……”^②迁到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学收到教育部的训令后,由杨成志先生拟定《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边疆学系组织计划纲要》,^③建议在文学院设立边疆学系,希望把边疆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这是在我国高校建设边疆学学科的最早倡议。该计划虽未获批准,但是,杨先生的学科构想当时即有部分在云南大学得到实现。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将西南研究区域具体规定为“以云南、西康、贵州为主,次及西藏、四川、湖南、两广,又及安南、缅甸、暹罗、印度、马来半岛诸境”,将研究内容细化为西南边疆之开发、移民、史地、界务、民族、文化、经略、对外关系,注重图书、档册、民间文献、器物的搜集,开展社会调查,发行刊物,出版丛书,与中南半岛诸国的高校建立合作关系,这些都在客观上推进了边疆学学科的建设。

昆明五华学院还进行了构建边疆学的尝试,该院边疆文化学系的建立开创了设立专门的学科单位以培养边疆学人才的传统,有利于形成培养边疆人才的风气。^④

江应樑代表民族学人类学界阐述“西南学”,表明“西南学”不是一个地域概念,它的提出是基于西南地区的共性、特点及其学术资源的丰富性,这是没有出现“西北学”、“东北学”概念的原因。虽然由于学术史的断裂,这一概念至今未得到普遍认可,但其透露的学科思维已很明显,值得参考。^⑤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长时期的积累,云南大学又于新世纪初将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列为重点建设项目,通过整理资料,出版丛书,举办高层论坛,召开和参与国内外重大会议,建立起了中国边疆学的基本体系,从而使云南大学成为全国较早树立起中国边疆学学科大旗的

① 参见杜边:《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4月7日第004版。

② 《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报告》,第282页。

③ 杨成志:《西南边疆文化建设之三个建议》,《青年中国季刊》创刊号,1939年9月30日。

④ 参见沙文涛:《构建边疆学科的一次尝试——私立五华文理学院边疆文化学系述略》,林文勋、邢广程主编:《国际化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

⑤ 参见姜贵品:《“西南学”考论》,《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16辑。

高校。

(四) 云南大学的中国边疆研究, 内容丰富, 视野开阔, 范围宽广, 参与学科多。云南大学的边疆研究对内以云南、贵州为中心, 兼及西藏、四川、广西等地, 长于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 对外以云南、广西为中心, 兼及东南亚、南亚等地, 长于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民族学等学科对中国与周边关系及跨境民族问题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 强调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世界史学科的方法与国际关系学方法的结合。同时, 自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起, 就注意到了文、理、工及医学等的结合。

从私立东陆大学开始至今, 云南大学的边疆研究均以西南为主, 但云南大学的西南研究涉及的都是大西南的概念, 不仅包括我国西南诸省, 而且还包括南亚东南亚诸国。尽管不同时期所涉及的范围有所不同, 但始终是在大西南的整体框架下开展研究。这主要源于云南特殊的地理区位, 它不仅与中国西南诸省相连, 而且又与南亚东南亚诸国接壤。

私立东陆大学鉴于“滇省西界西藏, 东南界安南, 西南界缅甸, 缅甸之东南又界暹罗”, 拟逐步开展西藏研究、缅甸研究、安南研究和暹罗研究, 注重云南在治藏、处理缅甸、越南和暹罗关系中的重要性, 从而注重涉藏研究、缅甸研究、安南研究和暹罗研究, 说明云南大学的边疆研究, 一开始就注重大西南的整体研究。《西南边疆》所刊文章, 涉及的研究区域包括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湖南、西康、西藏、缅甸等地, 也是大西南整体研究的反映。西南文化研究室“研究工作之地域以云南、西康、贵州为主, 次及西藏、四川、湖南、两广, 又及安南、缅甸、暹罗、印度、马来半岛诸境”, 更是云南大学西南研究所涉范围最标准最完整的表述。云南大学在致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呈文中说: “西南区域广大, 顾及全面, 力有未逮, 故暂偏重于边疆区域及中南半岛诸国之研究, 今后计划亦拟为此。”^① 这是迫于研究力量薄弱, 对国内部分有所收缩, 但对西南整体的重视没有变。“西南学”中的“西南边区诸省, 包括粤、桂、滇、黔、川、康以至西藏、台湾”,^② 虽未涉及南亚东南亚, 但仍是一个大西南的概念。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云南大学开设中国民族史、东南亚专门化等, 仍然是大西南整体研究的延续。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任务是: 西南边疆民族历史及其与国内各民族的关系史; 与越、缅、泰、老等国跨境民族史及其与这些国家的民族关系史; 云南地方史及其与西南邻省历史发展的关系;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历史。同样是基于大西南整体研究的考虑,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的民族关系研究不仅包括我国西南诸省民族关系的研究, 还包括跨境民族的研究。该中心的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也还兼及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南亚地区经济上的交流与合作等。

云南大学的边疆研究不仅地域宽广, 而且内容丰富。这是由我国边疆的特点决定的。我国边疆地域辽阔, 边疆问题具有复杂性和综合性, 需要多学科参与。如熊庆来校长就以“云南幅员广阔, 地势特殊, 气候寒热温兼备, 矿产丰富, 生物繁多, 水力之利所在多有, 人种之复杂尤为他处所鲜见, 其能提供于学术上之问题甚多, 而足为富国之资源至大, 且地

①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为报文化研究室工作概况请予设置员工并核给出刊经费事呈教育部》, 1016-1-585, 参见娄贵品:《方国瑜与中国西南边疆研究》, 第 222 页。

② 江应樑:《西南社会与“西南学”》,《中央日报·社会研究(副刊)》第 12 期, 1948 年 11 月 20 日。

介英法两大势力之间,国防上亦是重地”^①为由,向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申请在云大设立边政、采矿工程、冶金、工业化学、土木工程、热带病学、医学内外科、植物学、商科经济讲座各一人。^②作为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研究的首次学术总结的《云南史地辑要》一书,1949年底由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出版,由方国瑜、凌纯声、陈一得、张凤岐、罗常培、张席提、张印堂、何塘、杨堃、于乃义等著名学者撰写,内容包括云南沿革、部族、气象、边务、语言、地质史、地形、矿产、农村、文献共十篇,十分丰富。^③

(五)云南大学的中国边疆研究,始终重视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强调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举。方国瑜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学习期间即开始辑录云南地方史料。^④在参加勘界工作中,方国瑜非常注重相关资料的收集,包括会议记录、电稿、提案、判准书、图等,因为这些都是关涉国家领土主权的重要文件,勘界结束后,他都作了认真保存。^⑤

《省立云南大学申请边政讲座理由书》认为云南大学乃西南边区之最高学术机关,得地理上近水楼台之便,对于滇边之研究实负有诸项重大责任,搜集有关滇边之文献为其中之一。^⑥

西南文化研究室成立后,将编纂《二十四史云南文献辑录》纳入出版计划,但未能完成出版。为研究之需要,该室还计划全面搜罗资料:搜集图书、档册,记录民间传说、故事、神话歌谣等,成立图书部,供本室研究人员之参考,并公开阅览;搜集古器物与民族用具,成立博物部,以供研究并公开展览。同时,鉴于抗战时期“对云南文献之搜集、整理已成之长篇巨制,更不知凡几”,还拟于短期内出版“云南文化丛书”十种,“以作本省文献之宝库”。^⑦

方国瑜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部分的过程中,进一步搜集了与缅甸、越南、老挝有关材料。^⑧截至1980年底,云南大学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研究方面积累了上千万字的资料。^⑨经几代学人多年的努力,2001年,方国瑜主编的十三卷本《云南史料丛刊》^⑩终于得以面世。这是云南古代百科资料全书。^⑪

① 《熊庆来函请李书华提前在云南大学设置讲座》(1937年7月5日),刘兴育主编:《云南大学史料丛书·学术卷:1923年—1949年》,第169页。

② 参见《熊庆来函请李书华提前在云南大学设置讲座》(1937年7月5日),刘兴育主编:《云南大学史料丛书·学术卷:1923年—1949年》,第169—170页。

③ 参见潘先林:《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史地研究的首次学术总结——〈云南史地辑要〉概说》,《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④ 参见林超民:《名山事业 薪尽火传——〈云南史料丛刊〉编后记》,《林超民文集》第2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7页。

⑤ 参见方福祺:《方国瑜传》,第64页。

⑥ 参见《省立云南大学申请边政讲座理由书》(1937年8月),《云南大学史料丛书·学术卷:1923年—1949年》,第171页。

⑦ 娄贵品:《方国瑜与中国西南边疆研究》,第208、217页。

⑧ 参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叙录》,《思想战线》1979年第5期。

⑨ 参见张德光:《前言》,《西南民族历史研究集刊》第1集,1980年。

⑩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⑪ 杨文辉:《集史料之大成 树文化之丰碑——〈云南史料丛刊〉简介》,林超民主编:《西南古籍研究》(2001年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

近年来,云南大学有计划地整理西南边疆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调查和保存边疆口述史料,已取得显著成效。在重视资料搜集与整理的基础上,云南大学的边疆研究始终强调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举。

(六) 云南大学的中国边疆研究,始终重视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的联系与合作,取长补短,共同推进。西南文化研究室从中外关系史的角度,将中国西南诸省与南亚东南亚诸国作为一个整体,将与相关各国进行学术合作纳入计划,开展全面、系统的研究。20 世纪末以来,云南大学长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现中国边疆研究所)和复旦大学合作,联合培养人才,共同推进边疆学研究,目前已取得巨大成效。与四川大学的合作也在进行之中。

(七) 云南大学的中国边疆研究,学术传承清晰,代代相传,从未中断,表现出了深厚的学术传统。云南大学对边疆研究的重视始于 1923 年,但真正开始是以方国瑜的研究为标志的。在方国瑜开创和多年经营的基础上,又经尤中、朱惠荣等先生的努力,云南大学的边疆研究基础深厚,学风优良。到 21 世纪初,已形成颇具规模的学术队伍,产生了大批有重要学术影响的成果。目前云南大学的边疆研究队伍梯队完整、合理。这是云南大学多代学人多年来共同努力的结果。

三、新形势下云南大学中国边疆学的发展与建设计划

21 世纪初,云南大学提出建设中国边疆学学科,目标是将云南大学建成全国重要的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高水平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将云南大学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成为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优势和特色学科。建设计划围绕以下主要方向重点开展研究:中国边疆学理论、边政理论与实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边疆经济开发与对外经济合作、中国西南边疆问题研究等。时至今日,总结云南大学 90 多年来中国边疆学研究的成就及其特点,特别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国家地缘战略的调整,我们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提出以下初步考虑:

(一) 拓展研究视野与空间,将云南大学的边疆研究与中国南部边疆的安全问题结合起来。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总体规划及路线图的逐渐明晰,“走出去”战略及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工程必将逐步展开,移动边疆、利益边疆等问题将会成为中国边疆学重点关注的内容,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部及西南部边疆也将融为一体。云南大学具有长期关注历史时期中国南部边疆安全的学术传统,完成过《安南都护府与唐代的南部边疆》等论著。计划得到新加坡东亚研究所、云南大学兼职教授海疆问题研究专家的支持和帮助,统合历史系东南亚、南亚研究及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将西南边疆、东南亚南亚研究、海疆问题研究结合起来,深入开展中国南部边疆安全问题的研究。

(二) 紧密结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展,抓住“走出去”战略及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工程,将云南大学的中国边疆学建设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及“孟中印缅经济带”的建设之中,主动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学科建设的发展。在学科建设方面,继续高举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大旗。同时考虑借鉴私立五华文理学院“边疆文化学系”的建设,在云南大学历史系筹设边疆工作专业,扩大边疆学硕士生招生规模,提高边疆学博士生培养质量,与协同单位做好研究生的联合培养工作,完善云南大学中国边疆学从本科、硕士

到博士的培养体系。

(三) 在基础研究方面, 加强档案资料、《云南通志馆征集各县资料暨各县地志资料》、少数民族文献资料尤其是域外西南边疆外文(英文、法文)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我们知道, 近代以来的西南边疆问题始终与英法殖民主义的入侵紧密联系在一起。但近百年来, 中国西南边疆的研究, 始终是以中文资料为主开展工作的。我们缺乏另一方当事者的资料, 因而严重影响了研究的深入和分析讨论的客观性。近年来电子资源数据库的广泛使用, 使相关外文档案资料的远程使用成为可能。因此, 开展域外西南边疆外文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必将成为中国边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必将能够推动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向前发展。

(四) 结合政府部门及有关单位智库建设的需要, 努力将云南大学的边疆学研究建设成为国家有关中国南部边疆安全及西南边疆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工程的最为重要的智库。

(五) 1932年中山大学西南研究会创办《西南研究》杂志, 出版两期。1940年昆明的西南学会也出版《西南研究》杂志。1948年11月, 国立云南大学江应樑教授代表民族学、人类学界阐述了“西南学”。这也是一个新的增长点, 我们有必要继承民国以来“西南学”研究的传统和探索精神, 恢复出版《西南研究》杂志, 作为云南大学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学术交流平台, 从而推动新时代云南大学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发展。

总之, 中国边疆研究在学术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1948年著名民族学家卫惠林先生就说: “中国北部和西部边疆从上一世纪下半期起一直到本世纪的初头早被西方学者认为田野工作的乐园, 许多在欧西成名的东方学者, 都与中国边疆研究有关。”卫先生因此而倡议设立边疆大学。他认为: “边疆大学应有三个基本目标, 第一她应成为一个学术研究中心; 第二她应成为一个文化教育运动的中心, 第三她应成为培植边疆建设人才的中心。”“这样的边疆大学绝不应设在远离边疆的内地城市, 而应设立在各边疆地区的既成中心……只要有一群知识技术人才集中到那里, 给以充分的政治与经济力量的支持, 一个灿烂的文化中心不久就会建立起来的。”^① 云南大学因为地处边疆, 所以具有边疆研究的区位优势; 又因为长期重视边疆研究, 所以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学术队伍, 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可以说, 云南大学具有成为卫先生理想的“边疆大学”的条件和潜力, 我们正在向预定目标大步迈进。

[本文责任编辑 李大龙]

^① 卫惠林:《论边疆学术与边疆大学设置问题》,《边政公论》第7卷第3期, 1948年9月。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relations between the Yuan Dynasty and Korea.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study of the lives, feasts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Hong family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 their native country Korea, in order to give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about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is family and reveal the complexity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Yuan Dynasty and Korea.

Key words: Yuan Dynasty Hong Family People of Korean Origin

The Border Trade between China, Korea and Japa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aking Zhamen(栅门) and Woguan(倭馆) Trade for Example Liao Minshu (126)

Through researching market and trade between China, Korea and Japan, this article gives discussion of commodity circulation network between the three countries and their respective foreign policy. Due to different levels of development of state and society, China, Korea and Japan respectively took a different foreign trade policy, leading to difference in the way they administrated commerce and merchant. However, the trade pattern both in embassy and Zhamen in Beijing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and in Fusan Woguan between Korea and Japan were in accor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definition of border trade. Based on that, we can further think of the application situations of border trade in East Asian region.

Key words: Qing Dynasty Korea Japan Border Trade Zhamen Woguan

A Study of Modern Uighur Dress Culture in South Xinjiang Cheng Shanna (138)

Modern political reform had deep influence on lives of all peoples in Xinjiang, and Uighur as one of the main ethnic groups in Xinjiang, the change of every aspect of their life was typical. This article taking dress culture of Uighur in South Xinjiang for example, analyzes the character, reason and social function of cultural change of dress, to discus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Uighur social cultural change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 times.

Key words: Modern Times Uighur Dress Culture

The Borderland Studies of Yunnan University: A Review and Prospect Based on Subject Building Lin Wenxun Luo Qun Pan Xianlin (148)

Due to its geographic position, Yunnan University has been an important center to make China's borderland studies. In the field of China's borderland studies, Yunnan University has obtained abundant academic achievements, accumulated a lot of materials, experience and scholarship tradition, and has bee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state strategic decision and policy making process concerning its southwest borderland, and has received international affirmation and attention. Now, faced with complicated and changing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state's geopolitical strategy adjustment, it is very meaningful to review Yunnan University's China's borderland studies over the past 90 and more years, to conclude achievement, to discuss characters and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Key words: Yunnan University China's Borderland Studies Subject Building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Borderland Studies: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1988 - 2013) Zhu Jian Miao Wei (163)

With all the papers published by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from its founding year to now as the objective data, from three dimensions—papers, authors, and quote and being cited, this article makes statistical analysis,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status and developing trend of the content of this magazin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aspects, and to explore the academic developing dynamics in China's borderland geography and history studies.

Key words: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Data Statistical Analysis